

王重民与鼎新之际的国家图书馆

□ 马涛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王重民先生字有三，河北高阳县人，著名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时，在北海图书馆兼职以补贴生活费用。1929年毕业后先任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不久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1930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年以“教育部派考察图书教育”官员的身份赴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1938年被派赴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办事。1939年赴美，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归国，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国文系。

1948年12月21日，袁同礼馆长在北平围城期间，乘南京政府派来接运在平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的末班飞机赴南京教育部述职后，于1949年1月28日离别祖国乘船赴美。离平前将馆务交与王重民负责。王重民给全馆员工写了一封公开信，谦虚真挚地写到：“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籍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王重民先生以一介“书生”之力义无反顾，承担重任，足见其对北平图书馆之热爱。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王重民被任命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9月改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称“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同时兼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1952年5月，专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不再担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

引言

王重民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供职近27年，特别是在1948到1952年间，国家革故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也随之迈向新生之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图书馆事业发展之中。1951年王重民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2卷2期上发表了《图书馆工作者在今天的骄傲》一文。通篇文字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理想主义情怀。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于1949年条下写到：北京之解放，有三的激动和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他觉得开始得到新生，虽然还是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和北京大学讲课，但他感到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他这个曾经信仰马列主义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应如何更有效地建设新中国图书馆的事业，这是摆在他面前迫切解决问题。他决心倾注全部精力，改革图书馆及教育中种种旧的不良措施，以表示对新中国的热爱。^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王重民先生看到了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特别是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那时全国5.5亿的人口中，文盲占比达80%以上，广大农村的文

^①王重民：《冷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00页。

赠还《永乐大典》11册、《龙藏经》一部700余函、江苏瞿氏铁琴一张、铁琴铜剑楼匾额1方、善本书20种及收购书190种，文化部拨交的宋、元、明刻本善本图书53种240册等。二是积极促成并接受单位和私人捐赠，如1950年许广平捐赠鲁迅图书与金石拓本，傅增湘后人捐赠傅增湘所藏石刻、影印本、手稿、什物家具等，顾子刚捐赠《永乐大典》3册、甲骨文2盒等，195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赠《永乐大典》21册，周叔弢和赵元方也将他们收藏的《永乐大典》各一册捐赠给我馆。三是开展国际书刊交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书刊交换是我馆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成立国际交换组，专职负责该项业务，到1952年时，已经与16个国家的48个单位建立了联系，收到交换书刊8160册，不仅丰富了我馆的馆藏，也加强了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除了典籍的入藏外，王重民先生对古籍的整理也极为重视。刘修业先生回忆到：“他当时作过一个宏伟计划，拟在北大图书馆及故宫图书馆阅读善本书，撰提要一千五百种，在北平图书馆再撰提要二千种，之后再赴南方各大图书馆阅读善本书，连同以前在国外已撰成提要，约五千五百余种，除去重复部分，则可得一万种，然而人事沧桑，他未能如愿以偿。我为了完成他的遗愿，将他未刊的遗稿，编成《中国善本书提要》，虽只收所撰提要近五千二百余种（连同未出版的《补编》），由此可以窥见他对古籍善本书的阅读，孜孜不倦之一斑。”^①在王重民先生去世后半年左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10月病重期间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1978年3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刘季平、顾廷龙组织实施，历时18年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一巨大文化工程收录大陆地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藏书达13万部。

二、适应形势，调整机构

1949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接管松坡图书馆及藏书，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分馆，借此对组织机构做了微调。

1950年5月草拟并上报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组织条例》，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北京图书馆组织条例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下，依过去的历史发展，现在的具体情况和最近、将来可能试办的新计划制定的。第四条提出，为建立民主集中制，以推进馆务，由馆务会议协商并决议全馆重要事项。并规定不论是馆务会议还是秘书处会议、部务会议，分别要有工会代表、工会福利部代表、该部职工代表二人参加。第十一条，为领导研究加强业务的改进，聘馆内外专家及大学教授组织顾问委员会，就业务上之需要，分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图书馆学专门委员会、分类编目专门委员会及咨询顾问专门委员会等。组成秘书处、采访部、编目部、善本部、阅览部、参考研究部6个部处和3个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1951年3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准了北京图书馆基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业务开展的实践和参照苏联图书馆组织规制形成的《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作为纲领性文件，首次明确了北京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即成为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

^①王重民：《冷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1951年11月文化部文物局批准了暂行组织机构,即采访部、编目部、阅览部、苏联研究室、参考辅导部、善本部、特藏部、保管部、总务部、馆长办公室、由学术秘书主管的文书股、人事股。按馆长分工,王重民先生分管采访部、编目部、阅览部、苏联研究室。这次机构改革是继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机构重组后,源于全国教育和出版事业等外部环境的发展,在办馆理念、馆藏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和员工队伍素质和规模等内部因素影响下做出的现实安排,奠定了此后近30年的基本业务管理框架。

三、调整理念,拓展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王重民先生满怀对新中国未来发展的憧憬,学习吸收苏联经验,并结合10余年欧美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悉心观察与思考,对图书馆服务工作进行了诸多改革。

(一)重新规定凡是年满16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高中以上的学生,都有权利成为我馆读者。通过发放读者意见表,了解读者对于阅览、参考和群众工作方面的要求与希望,以及其他对于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希望由此把握读者的兴趣特点,以更好地开展读者服务工作。通过不断开辟新的各种不同功能的阅览室、尽力延长开馆时间、开放夜馆等措施,拓展阅览阵地,延伸阅览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1949年3月28日,位于北海公园悦心殿的“新文化阅览室”开始接待读者。这个阅览室的辅助书库负责收藏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书籍以及解放区出版物,并且于4月2日在各报刊刊登启事,征求五四以来新书。另外,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通告有关部门,“国立北平图书馆于2月13日为本会正式接管……蒋管区各地方出版期刊日报,多有收藏;但我解放区内印行者,则多付阙如,因此特为介绍,请将你处出版的期刊日报按期寄赠该馆一份,(能由创刊号寄一全份尤佳)”^①。

(三)为指导和组织本市少年儿童阅读,1950年5月8日,北京图书馆联合团中央青年服务部在文津街院内开辟了少年儿童阅读园。以连环画和图画故事书为主,如小朋友、中华少年及少年自然科学丛书等2000册,供少年儿童入园阅览。1953年2月又成立了拥有一百多个座位的少年儿童阅览室。儿童阅览室还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少年儿童服务员,担任图书阅览、出刊“少年园地”、协助组织讲故事歌咏等工作。仅1954年一年,到馆的小读者就达70800多人。

(四)为了配合国家建设、满足基层读者对图书资料的需要,北京图书馆以图书流动站的形式,送书上门,到工厂、工地、农村和部队开展图书流通工作。王重民先生1947年9月11日在北平广播电台播讲《美国的图书馆》时对这种服务形式就有描述: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了乡村僻壤的居民,有巡回图书馆;为了这次世界大战,有战地服务巡回图书馆^②。北京图书馆这项工作始于1952年。北京图书馆先后在北京郊区第一棉纺织厂工地、官厅水库、京西矿区、丰沙铁路线、南苑五里店农场、北京市建筑工会等处建立了40个图书流通站,

^①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②王重民:《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官厅水库流动站。1952年到1955年，图书流通站流通的图书达15000余册，图书流动服务读者约10万人以上，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①



图1 流动书车送书下乡

（五）编辑整理参考资料，解答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一般读者的咨询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1950年8月重组充实参考咨询组，至1952年11月完成规章制度建设和人员配备，1953年就编制完成了几十种专题书目索引，截至1958年底，已经编成的书目达300余种。1957年原参考研究组扩编为参考部，下设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两个参考组，并调入各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其它专业人员。五十年代后期，北京图书馆就拥有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律、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十多个专业的参考咨询工作人员三十多人。

（六）为了满足到馆科研读者的需求，在普通阅览室、科学技术文献阅览室中也设有辅助书库，部分或全部采取开架方式。此外还设有资料室、研究室。资料室供读者阅览特殊报刊资料，研究室供一部分读者进行专门研究工作，例如“当时柳亚子出资，请谢国桢增辑《晚明史籍考》。有三在北京图书馆，另辟研究室一间，并组织“明季史料讨论会”，帮助谢先生作修改增辑的工作。”^②1949年5月重新制订了研究室规则，申明：本馆为便利政府人员与

^①程鹏：《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2期，第13—16页。

^②王重民：《冷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学术机关之特别参考，设立研究室；研究室人员提取书籍以二十种为限，并请用毕随时送还出纳柜，以免妨碍他人阅览。



图2 研究室内景

（七）为了扩大服务范围，1949年5月开始实行《馆际借书办法》，即：各图书馆因借书需要并欲彼此互通有无而愿馆际互借书籍者，须由图书馆馆长负责签名盖章，并先期派人来馆接洽，一经商定，即可借书。其无图书馆之机关，由各该机关首长负责签名盖章，指定专人洽办。

（八）面向公众举办讲座是公共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多以演讲会或宣讲会为名。“民国二十八年（1939）教育部公布《图书馆工作大纲》，在省图书馆之工作一项下规定：‘办理各特藏专室，设立各专室讲座；举办图书馆员讲习班；举办全省图书馆员研究会’；在县市图书馆之工作一项下规定：‘办理各项学术演讲；举办读书顾问，指导民众进修’。”^①而国家图书馆自1909年创办起就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因此很多普及性工作并未开展。这也是尹达、王治秋在文化接管委员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平馆存在的所谓重要不足：（二）过去你们认为普及的工作应由市图书馆来做，这种分工有部分理由。但本馆是全

^①蔡彦：《研究学术 开通知识——中国图书馆讲座的百年历程》，《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10年第3期，第55—64页。

国最大图书馆，今后要做示范性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在全中国图书馆事业上起模范领导作用。^①

目前所知北京图书馆面向公众开展的第一次讲座是国立北平图书馆 1950 年工作总结中所记载，为配合 6 月 18 日开始举办的“高尔基生活作品展览”，由《高尔基论青年》的作者之一，即苏联教授维诺格拉多娃举办的一次讲演会，“主讲高尔基的创作道路给参观者以很好的影响，这种方法虽然只用了一次，而它的成就是很大的”^②，这也为 1953 年之后北京图书馆讲座蓬勃发展做了有益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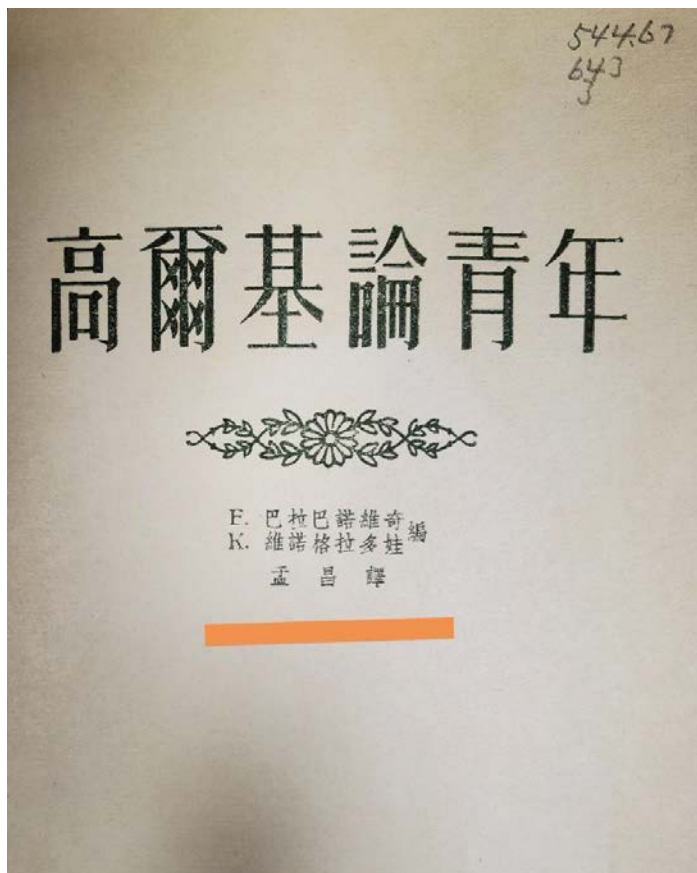


图 3 《高尔基论青年》，1956 年 4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九) 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展览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展览除了展览种类更丰富、展览方式更多样、社会影响更广泛。1950 年 9 月规划、1951 年 10 月验收使用的专用展厅建成后，为此项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1952 年就举办大小型展览 15 次，图片展览 31 次。

宣传保护古籍文献，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1950 年至 1952 年，北京图书馆先后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古籍展览：解放以来新收善本书展览、《永乐大典》展览、中国印本书籍展

^①林世田：《同舟共济 共护国宝——王重民与和平接管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23 年 7 月 25 日 17 点 01 分发布。

^②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606 页。

览。“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第一室陈列的古代精刻本有许多是藏书家们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的。“他们所捐献的是，或保存了百年以上的，或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①。

外国书刊展览也是北京图书馆的优势。1950年与北京市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举办“苏联出版物展览”，1952年，举办“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除了马列主义著作的中俄译本外，还展出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俄译本”以及“苏联文艺作品与中译本”，参观人数达63000多人，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加强^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走出国门参加的国际展览能明确以图书馆为主体参加的展览极少，而1950年莫斯科“中国艺术展”就是由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提供的展品，另一次则是1955年北京图书馆赴瑞士协助布置的“古今书刊展览”。

此外，相继举办的大型纪念展览还有：五四史料展览、“七七”抗日战争史料展览、太平天国革命史料展览、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展览等。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对国家图书馆立下历史功勋的领导和著述等身的学者、教育家。先生远渡重洋，所带回的照片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和太平天国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种文献回归方式具有典范意义，可谓是“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先声。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目部分”的北京、伦敦、巴黎三处的馆藏目录和从各处搜集的被称为“敦煌遗书散录”的19种目录，直接划定了国际敦煌项目合作的资源范围。

在王重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贡献，为的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图书馆人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坚持真理、开拓进取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尤其是毕生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

^①郑振铎：《“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引言》，《文物》，1952年第4期，第1—4页。

^②新华通讯社：《北京图书馆举行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新华社新闻稿》，1952年第925—955期，第168—169页。